

地及其经济的发展和变化，反映了根据地经济结构的变化。

(四) 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财政措施

1. 发行公债。1932年6月，蒋介石调集了50万兵力，向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“围剿”。为了准备充分的革命战争经费，使红军能够胜利地粉碎敌人第四次“围剿”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于同年6月25日决定，发行短期革命战争公债60万元，规定半年还本付息。同年10月21日，中央政府又决定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20万元。革命战争的迅猛发展，要求苏维埃政府动员一切力量、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，以保障革命战争的物质供应。为了解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，1933年7月11日，中央政府决定，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，规定五年偿还。

2. 向群众借粮。1933年2月，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战争进入第二阶段，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起了进攻。为了保障红军给养，同年3月1日，中央政府决定向群众借谷20万担。1934年夏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战争激烈进行，红军迅猛扩大，需要大量的粮食供给，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联合发出《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》，要求各级党和政府“发动群众借10万担谷给红军”，并“于7月10日前完成”。同年7月22日，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又决定，在秋收

中向群众借谷60万担。

3. 发动群众节省捐献。1933年和1934年，中央苏区的广大群众响应政府的号召，开展了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米的运动，仅1934年6月的24万担粮食动员中，就有7万5千担属于群众的节省。同年，还开展了每人每天节省一个铜板的运动，自愿地捐献给政府，充裕革命战争经费。据中央财政部的统计，仅1933年4月至9月，群众的节省与捐助共达151,173.20元（《红色中华》，1933年9月30日）。另外，广大群众还响应《红色中华》的号召，退还了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券和借谷票。第一期公债已从土地税和商业税中偿还，第二期公债原定1934年6月偿还，可是到5月上旬，广大群众已经退还了90余万元。群众还将1933年的借谷票，有的直接退给了政府，有的改成了节省。总之，不要政府偿还了。节省运动，对政府的财政的确有很大的帮助。同时，应当指出，要求群众退还公债券和借谷票，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做法。

另外，值得一提的是广大群众对红军的热烈慰问，每次都捐献大量的慰问品。这对苏维埃政府的财政也是一种支援，而且对红军英勇作战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。它既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自己子弟兵的无比热爱，又反映了红军同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。

民  
不  
举  
官  
不  
咎

虞  
孝  
元

会计员小丁向财务科长汇报：三车间卖了一堆废杂物，钱没交帐，准备给大伙买电影票。科长听了，立即指出这是违反财经纪律行为，必须坚决制止。可是，当小丁正要去制止时，却又被科长叫住了：

“这事呀，说大就大，往小里说也不算事。你瞧，总共才几个钱？左不过为大伙儿办点好事，又不是掖了谁私人腰包，能算了什么大问题？硬要去制止，到头来准落个里外不是人！”

“这该怎么办才好呢？”小丁有点发急了。

“好办！”科长稍为想了一下，十分果断地说，“民不举，官不咎。就当你没对我说，我也只当没这回事。真的有人正式反映上来，就转报厂长请求解决。反正让我们主动出面当恶人，犯不着！”科长说完，一转身走了。

“哦？！”小丁似通非通地愣着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